

从社会失范理论视角探析犯罪片的叙事策略

——以近五年国产犯罪片为例

谢柳薇 贾冀川

摘要 | 近年来，国产犯罪片佳作迭出。社会失范理论中关于社会失范、越轨行为的论述对追溯这些国产犯罪片中犯罪者的犯罪动机以及反思社会规范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制度调整空隙”与“社会矛盾扩大”是影片中呈现的社会失范状态，而“创新”与“退缩”等越轨行为则对人物刻画起到了塑形的作用。从社会失范理论视角探析犯罪片，目的是给予观众正确的价值观引导，让观众思考犯罪背后的社会原因。

关键词 | 社会失范理论；越轨行为；国产犯罪片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从犯罪学的视角来看，一种犯罪行为的存在绝非偶然，犯罪者所处社会的失范潜因是不可忽视的。在正常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必须由社会规范控制；这些规范应该形成一个完整的，没有冲突的体系；个人应该在道德上与他人发生关系，以便一个自我完满的人的形象变成与我的形象不能分离的形象，并且给生活中所能得到的快乐规定明确的界限。凡是存在着不明确的、彼此冲突的、分散的地方，个人与他人就不存在有道德意义的关系，或者没有规定获得快乐的界限，这就

是社会失范状态。^[1]这一理论由迪尔凯姆最先提出，而后，罗伯特·默顿等学者又延续其观点继续深挖，完善并发展了社会失范理论。

近年来，国产犯罪片佳作迭出，而观众对于这一电影类型的热烈反响也印证了市场的取向。然而，将犯罪者作为主角，以犯罪事件作为刻画对象的电影制作是颇具禁忌意味的，把握不当将对社会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因此，如何更好

[1] 郭星华：《社会失范与越轨行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地把握犯罪片的叙事策略便显得尤为重要。现阶段，运用类型片发展的相关理论对犯罪片进行的研究已经比比皆是，而将研究视角拓展至影片外部，从社会学、犯罪学出发，依托社会失范理论对犯罪片的叙事构建进行分析，或许能够带来更具开拓性的新意和惊喜。

一、冲突着的矛盾社会：社会失范状态的呈现

迪尔凯姆认为，“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作社会事实”。基于这样的认识，迪尔凯姆确信犯罪并非源于其他的特殊原因，而是源于它所从属的文化结构本身。因此对犯罪的研究应始终与特定时期现存文化联系在一起。^[1]简而言之，在社会转型时期或急剧变迁时，社会规范处于调整的状态下而呈现某种失范状态时，个体为了满足过度膨胀的欲望而采用不适当的方式达成，便产生了犯罪行为。

纵观近五年的国产犯罪片，创作者大致将镜头聚焦于“制度调整空隙”与“社会矛盾扩大”这两种社会失范状态。

第一种，是社会处于“制度调整空隙”这一失范状态时，影片对犯罪乱象景观的呈现。

《南方车站的聚会》将时间设定在了20世纪90年代末。当时的中国正处在经济改革与社会变革的风口时期，但经由国企改革，一大批工人下岗。从“老大哥”变成了社会闲散人员，他们还未能适应改革下新生活的轨道。再往前追溯，中国一共出现过三波婴儿潮，分别是1950年、1965年和1980年前后。20世纪90年代，在第三波婴儿潮出生的农村孩子纷纷长大，其中大部分念完初中就走上了外出打工的道路。而在当时，大量初期成立的乡镇企业倒闭，青壮年无法谋生，寻不到出路，成了无业游民。大量的无业游民使得城

乡的治安恶化，大大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车匪路霸横行，各个城市的火车站都成了藏污纳垢的集中点。

故事发生在武汉野鹅塘湖区，是一个鱼龙混杂，管理失序的地方，那里聚集了大量的“灰黑色人物”：有成群结队的“陪泳女”，有心狠手辣的偷车党。偷车党形成了组织，甚至会开展“小偷比赛”。他们“开会”的地点就选在某便捷宾馆的一楼，面对不满意的势力范围分配，内部两个小帮派直接选择了斗殴，战至酣处的黄毛更是直接掏枪射击——就算在一个社群的内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也相当原始和野蛮，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轻易地刀刀相见。在乱象丛生的社会里，所谓的道德与义气在金钱诱惑面前根本不值一提。而面对血流成河的斗殴现场，宾馆老板除了有些不情愿，却也见怪不怪。种种不安的因子在城乡的灰处蠢蠢欲动，揭示了社会正处于失范的危险状态。

第二种是社会处于“社会矛盾扩大”的失范状态的影片背景搭建。

继迪尔凯姆之后，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在其著作《社会结构与失范》中将迪尔凯姆的失范观点应用于分析美国社会，从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发展了自己的失范理论。他认为犯罪行为是社会系统不平衡的产物。

《误杀》的创作者将故事发生的背景设定在了赛国（也就是泰国），并将批判的视角集中到了社会财富与权力的巨大倾斜导致的阶级对立上。在影片中，创作者极力塑造了一个法治失真、当权者只手遮天的社会状态，其中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凸显“恶警察”的丑陋嘴脸。作为警

[1] 韩笑莲、王广郊：《社会失范理论——浅析迪尔凯姆和默顿的犯罪学思想》，《法制与经济（下半月）》2008年第1期。

察，桑坤非但没有保护平民的意识，反而用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打压、欺诈弱勢百姓。警察桑坤作为一个强指向性的符号，指向了赛国法治的真空与社会的失范。同时，观者也在开篇就立刻被拉入了情境：连一名普通的警察都如此嚣张跋扈，遑论那个溺爱孩子，替子出高价摆平故意伤人案的警察局长拉温。所以，当发现妻女误杀素察后，李维杰第一时间打消了报警伏法的念头：“现在报警连坐牢的机会都没有”。由此，观众也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李维杰瞒天过海保护家人的脱罪之路。

默顿进一步提出，如果社会成员利用合法的手段能够达到其目标，就不会产生紧张和越轨行为，有助于社会结构的巩固。但如果目标与手段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出现不和谐的状态，就会促使社会结构的瓦解，即价值崩溃、失范。^[1]

《误杀2》虽然没有在情节上延续《误杀》的故事，但是二者在背景设置和价值内核上有着非常强的相关性。同时，《误杀2》直接地将主角林日朗设置成了暴露在明处的、从法律角度无可辩驳的劫持犯，更加细致地描绘了他面对阶级矛盾扩大而产生的自体不和谐状态，以及最终暴起反抗的心路历程。

《误杀2》营造出了医社保体系不完善，以及阶层对立，黑色特权盛行的多重困境。林日朗在面对来自金钱短缺的挫折时，已经因为无法通过合法的、社会认可的手段达到筹钱的目的了：医治儿子需要高昂的医疗费用，林日朗倾家荡产也无法凑齐。唯一可能给予希望的医疗救助申请却需要四十一天才能进行审核，于是林日朗去借了高利贷——这是他向危险边缘的试探。更加绝望的是，林日朗狼狽地准备好了手术需要的费用，却发现已经与儿子匹配的心源下落不明，这等于直接给孩子判了死刑。面对“钱与势”皆无，只能被挤压在生死线上

的双重挫折，普通人林日朗已经无法用寻常的途径去突围，这让他直接走向了挟持人质的极端犯罪。影片通过强化对立冲突，将人物目标和手段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为故事做好了社会失范的背景铺设。片中还设计了一名意欲刺杀医生，为妻子报仇的人物，他与林日朗一样放弃了用合法的手段捍卫自己权益的抗争。借他之口，林日朗的无奈被直接点明：“如果只是因为钱，他有很多条路可以走，不会拿枪。”从中，也能探知赛国社会阶级矛盾暗流汹涌，危机四伏的社会失范状态。

二、“创新”与“退缩”：越轨行为对人物的塑形

所谓的越轨，其实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社会学家从不同角度出发提出了社会建构说、规范违反说、开放的越轨定义等几类来界定越轨行为。然而要将视野限定在犯罪学领域，并从犯罪学视角出发来探析社会现象，便需要明确的、区别于“感觉”的科学定义。“从起源上来看，犯罪学的诞生是不满足于刑法在犯罪控制方面的无力，因此，犯罪学必定要以法定犯罪为最主要的关注对象。”基于这个判断，犯罪学视域下的越轨行为便是违反道德准则和部分法律的行为，其中部分法律包括了民商事法律、治安法规、经济法和刑事法律的行为。^[2]

默顿根据对社会文化所赋予的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所需手段的态度把越轨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即创新、退缩与反叛。由于近五年的国产犯

[1] 韩笑莲、王广郊：《社会失范理论——浅析迪尔凯姆和默顿的犯罪学思想》，《法制与经济（下半月）》2008年第1期。

[2] 谭远宏：《犯罪学视野下的越轨行为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0，第15页。

罪片中对“反叛”^[1]几乎没有着墨，因此下文将结合影片重点论述“创新”与“退缩”两个方面。

“创新”，是指人们接受获得权财的社会目标，但是拒绝通过劳动，而是采用新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所谓“新的手段”往往是不被社会制度所认可的方式，例如偷窃、抢劫、诈骗、受贿等。简而言之便是通过非制度性手段实现制度性的目标。^[2]“创新型”越轨是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越轨类型，也是犯罪片中大量被呈现的类型。

影片《铤而走险》中的夏涛就是这一类型的典例。夏涛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有钱才是人。”在身受重伤之时，夏涛不顾一切地让救治他的夏西去追回两百万的绑架钱，最终却因为这一决定而错过治疗时间，失血过多，孤独地死在了冰冷肮脏的废弃厂房。对于夏涛来说，没有钱，就不是“人”，没有钱，就算有命活着也没有任何意义。追逐财富的执念驱使他神挡杀神，佛挡杀佛，走上了亡命天涯的道路。可以说，夏涛将自己的生命献祭给了金钱，对自己的生命尤此，他对其他人物的冷血手段便不显夸张。

如果说社会边缘人的创新型越轨行为是通过偷窃、抢劫等手段实现的，那么在社会中有一定影响力的人们，则更多通过偷税漏税、收受贿赂，以及威胁恐吓等手段完成这一目标。《风平浪静》中，李唐依托市长父亲与被其胁迫的建委一把手宋建飞在房地产行业横行，通过权钱交易获得了大量财富后，他的野心依然没有得到满足。为了全面开发富人区，他甚至直接对不愿搬迁的万小宁痛下杀手，并做局嫁祸给宋浩。追析李唐的成长过程，为朋友出头其实借助的是市长父亲的威名；能够不费吹灰之力越过高考升入名校，也是因为父亲玩弄权力的结果。从这些细节背后，我们不难猜测从小耳濡目染官场之声色犬马的李唐是如何被权力与财富扭曲异化的，因

此，当故事时间从普通的高中生李唐跳跃到狡诈的房地产商李唐时，我们不会感到奇怪——通过非制度性手段能更加轻松地获得更为巨大的权财，李唐何乐而不为呢？

“退缩”是指退缩者不再将社会总体认同的目标作为自己奋斗的方向，同时也抗拒社会所认可的实现这类目标的正当手段，实际上就是自暴自弃。“他们寄居在社会中，但逃避社会竞争和社会现实，脱离社会的正常生活。酗酒者、吸毒者、自杀者是这类人的典型表现。当逃避完成以后，这种冲突就消失，个人就会得到解脱”^[2]。

《风平浪静》中，宋浩在少年时期失手“杀害”了将他误认为小偷的万有良，这份罪恶感成了宋浩的心魔，他从一个“别人家的孩子”沦落为了只能隐姓埋名的石雕厂工人。宋浩在十五年间自我放逐，导演也将他塑造成了一个几乎无欲无求的人——他沉默寡言，开着一辆老旧的小破车，面对热情的潘晓霜几乎无动于衷。不论是对物质的追求，还是对性的原始欲望，宋浩都表现出了游离于世俗之外的“淡然”。有观众认为宋浩是低调，是害怕警察发现他与十五年前那场命案的关联，但如果宋浩害怕的是被发现身负命案，那么他不会冒险留在西园，更不会冒险与老警长的女儿结婚。而在笔者看来，宋浩是在逃避现实，试图摆脱自己良心的叩问，他的自暴自弃实际上是一种“苦行僧”式的自己惩罚。与潘晓霜结婚后，宋浩短暂地忘却了内心的冲突，重新

[1] “反叛”即拒绝接受普遍的社会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而是希望通过反叛建立起与现代社会具有不同目标的社会激进分子。参见谭远宏：《犯罪学视野下的越轨行为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0，第20页。

[2] 谭远宏：《犯罪学视野下的越轨行为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0，第20页。

找回了生活的方向，成了一名高速公路收费员，但是他心灵深处的“退缩”阴影并没有消散。因此，当新的危机袭来，宋浩心底的郁结再次占领高地，他拿起刀捅向自己和父亲，通过自杀与弑父完成了这场悲剧的“解脱”。宋浩的结局是令人惋惜的，他一再再而三地被他人推向深渊，他虽然善良敏感，但优柔寡断，不敢面对现实的逃避倾向最终成了毁灭一切的匕首。

三、越轨与失范的现实意义之再审视

（一）赎罪之路

梳理近五年的国产犯罪片，几乎所有影片中都出现了“赎罪”这一线索。犯罪者摇摆在越轨行动与道德内省间，这种挣扎通过“赎罪”的形式被呈现出来。

有学者从心理学出发提出了“聚合作用论”。“该理论认为，社会条件、个体条件、越轨行为这三者处于动态的作用之中，仅凭对任何单一因素的分析，或只对这三方面进行孤立分析，都不能对问题作出恰当的解答。只有对这三方面的聚合作用进行研究，才能揭示越轨行为产生的原因。”^[1]《铤而走险》中的主角刘小俊在影片里完成了巨大的人物转变，从唯利是图的小人转变成了挺身而出，机智斗敌的英雄。虽然从宏观上来看，刘小俊的转变给故事带来了更多的张力，也使得戏剧的结构更加跌宕起伏，但是从微观上的塑造来说，这种生硬的转变并不能让观众买账。

从“聚合作用论”的理论视角倒推刘小俊越轨行为发生转变的过程，不难发现影片并没有在社会条件与个人条件的部分作出相应的变动。催债人的压迫、地下赌场的诱惑，以及刘小俊自身的浑浑噩噩都使他的道德感极度低下，几乎不用其他外力的推动，他就自动滑入了犯罪的轨道。当他发现被绑架的小女孩奇奇会遭遇危险时，刘

小俊心底的某一块良知被唤醒了。随着情节的推进，刘小俊逐渐被奇奇与张茜等人所打动，最终放下对财富的执念，选择通过自己的力量与警方合力从悍匪夏西手中救出奇奇，完成自己的了“赎罪之路”。

在上述过程中，社会的法律制度并没有发生改变，对刘小俊一类的犯罪分子将采取的制裁举措依然如故；退一步看，促使刘小俊走上犯罪道路的债款压迫也并没有消失，社会没有能给刘小俊提供一个合法的制度化手段可以使其摆脱困境。同时，在刘小俊身上，我们也没有看见质的改变：如阶级的跃升，或是通过某件事后来自灵魂深处的醒悟，使其重获个人目标等。因此，仅仅因为人物情感的突然转向而急转直上的情节，令观众摸不着头脑，也难以共情理解。这一问题在国产犯罪电影中屡见不鲜，值得深刻反思。

同样行走在赎罪道路上的还有《热带往事》中的王学明，他的变相“赎罪之路”，即试图回归道德轨道，却又走向犯罪歧路的紊乱，其实是社会中“真空”状态的暴露。所谓“真空”状态，是指因传统因素解体与现代因素涌入之间而出现的力量失衡状态。在“真空”状态下，社会为其成员所提供的现存规范并不能全面覆盖人们的行为。“人们在‘真空’状态中，可以遵循原有的规范，也可以遵循新的规范，还可以遵循自己创造的规范，而无论遵循哪一种规范，其结果都会受到其他规范的排斥甚至制裁。”^[2]

《热带往事》的故事背景为1997年的广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化的推进，当时的广东地区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飞速发展。但在此欣欣向荣的大局面下，悄然增加的不仅有贫

[1] 郭星华：《社会失范与越轨行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2] 郭星华：《社会失范与越轨行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富差距，还有因为城市现代化迅猛推进而带来的规范失衡。

王学明在肇事逃逸后，其实有想过自首，但在警察局内，他的自首就像一场笑话——忙得不可开交的警察直接忽略了他的自首，一旁被手铐铐住的女人像失了智一样疯狂嚎叫。象征着秩序的警察局内一片混乱，暗示着当时规则的被冲击，也即社会的“真空”状态。从这个角度出发，王学明心底不愿意违法，不认可犯罪，却无法在“真空”的社会中找到亡羊补牢的自治之法。于是乎，他的赎罪之路是伴随着越轨行为的：在良心备受煎熬的情况下，王学明主动加入了一场与他毫无关系的街头斗殴——他身负罪疚赶，他渴望被惩罚，他尝试用越轨的行为来减缓内心的矛盾——他的尴尬境地已无法被“真空”状态下的任何一种规范所容纳。

（二）以“父”之名

国产犯罪片中，许多犯罪行为往往有“父”的在场。这里所谓的“父”不仅指生理意义上的“父母”，也指向了“当权者”所代表的权力压制。在不同的影片中，“父”呈现出的姿态也是不同的。

在《风平浪静》与《兔子暴力》中，“父”作为既善又恶的一面出现。

《风平浪静》中，宋浩的父亲宋建飞为了保护宋浩，对受害者施以致命一击，这成为宋浩悲剧人生的真正开端——正当防卫加上未成年人保护法，宋浩很有可能得到从轻处罚。但父亲宋建飞亲手断送了儿子通过合法途径为自己申诉的可能。宋建飞出于对儿子的爱与善让自己走向了犯罪的恶途，同时他的所作所为也给正处于三观建立关键时期的宋浩带来了颠覆性的毁灭，这是宋浩最终弑父并自尽的悲剧根源。

《兔子暴力》里，母亲曲婷的出现给极度孤独的水青带来了光亮，水青变得自信开朗，这是“父之善”的功效。然而，当曲婷遇到经济危

机，水青“挺身而出”，策划了一场令人心惊的“绑架案”。曲婷站在“父”的角色上，却默许着这一切的发生，虽然她并不是水青的法定监护人，但作为一个理应给予孩子正确价值观引导的成年人，她却将水青反向引到了犯罪的领域，这则是“父之恶”的现身。

上述两部影片中，“父”的存在贯穿始终，但他们应该起到的正向作用却缺失了，甚至打着“为你好”，以及“为了我们”的旗号，将孩子们拉入了深渊。面对这样的惨剧，我们不禁对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源头——原声家庭——进行反思。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家庭与校园都是独属于他们的“小社会”，当“小社会”中出现了失范现象，他们眼中大社会的规范也就无法建立，在认识都被扭曲的情况下，越轨行为就很难不发生了。青少年犯罪呈现在国产犯罪片中不是主流，许多人将青少年犯罪归结于“性本恶”，但真实情况是，在青少年犯罪事件中，犯罪者也是受害者。

在《误杀》与《误杀2》中，“父”则是直接作为恶的一端出现。拉韞为了找到儿子，利用警察局长的身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便将李维杰一家扣至警局审问。在发现素察罪恶地拍摄了李平的私密视频后，拉韞为了维护儿子，强令Pony删除视频，销毁证据，亵渎了警察的职位。后来，为了逼迫李维杰一家说出素察的下落，她又用李平的私密视频作为要挟，彻底失去理智，走向完全的非非法。从理应公正执法的“警长”退格到不顾一切的“母亲”，拉韞以“父”之名默许了自己的越轨。在《误杀2》中，市长对林日朗说：“你不知道一个父亲为自己的孩子都能做出些什么。”他深知自己不该利用权力破坏规则，却无法割舍父子私情，心怀愧疚地走上了越轨道路。

在这一视角下，对权力持有者的自我约束问题发人深省——以“父”之名的越轨不应当成为

为犯罪开脱的借口。“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古往今来的人对“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愿景。但一旦“小亲”与“大亲”相冲突，“小子”与“大子”的性命只能择其一，规则的制定与遵从只能是唯一标准。透过这两部犯罪片，我们应当认识到，对权力持有者的权力约束规则需要尽善尽美，否则在他们的世界里，一旦目标与手段不匹配，带给社会的不稳定结果将倍于普通的越轨：面对警察局长、市长的以“父”之名，李维杰、林日朗也以“父”之名进行反击，当社会中的人视规则为无物，社会也就崩塌了。

（三）乌合之众

有学者从经济学理论分析越轨行为出现的原因，认为理性行为的目的是在社会规范认可的范围内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润，越轨行为的目的则是通过违反社会规范的方式，以低于合规行为成本的低成本获取更多利润，这部分利益便可被称为“越轨利润”^[1]。

《误杀》的英文片名为*Sheep Without a Shepherd*，意译成中文便是“乌合之众”，这也是对全片内核的一个引申。在《误杀》与《误杀2》中，均出现了群众暴起的情节。《误杀》片中，当群众意识到所处社会的失范、规则的内溃，采用合规手段所能获得的利益将微弱至极，他们出于对利益（不仅局限于金钱）的追求，便在狂欢式的群起中越轨，在乱象中追求最大化的“越轨利润”。这是用越轨行为对抗社会的失范，是一场对法制的“误杀”，这也是李维杰最后选择自首的原因，他希望用自己的伏法换回秩序的稳定——看见各处不法分子趁机而起对社会造成的

破坏，他意识到了遵守规则的重要所在。

从“越轨利润”的观点出发，我们打开了看待大众集体越轨的新视域——在现实生活中，网络暴力便是最常见的大众集体越轨，其广泛而频繁出现的原因，或许正是由于这一行为所需要的成本太低。《误杀2》的导演戴墨在采访中谈到，设置在医院外的围观群众其实正是影射了网络舆论中的暴力。人们隐匿在人群中，不负责任地“无脑”跟风，肆意发出片面、充满私利的声音。这种现象需要更多的社会关注与反思——“越轨利润”无论是成本还是最终的收益都需要得到更好的控制，从个人到社会都要警惕“越轨利润”目标主体的扩张。

四、结语

近五年国产犯罪片的发展呈现出了多元化的探索态势，创作者们试图用不同的视角讲好犯罪故事，这样的发展是我们所乐意看见的，但值得指出的是，由于犯罪片所涉及的现实因素纷乱庞杂，许多创作者或许会在一番挣扎之后放弃用贴近中国社会实情的背景进行故事架构，而仅将目光聚焦到故事情节的铺陈上。从商业化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尝试打开了犯罪片发展的新途径，但这种策略也阻碍了犯罪片对社会与人性根源剖曝的严肃内核的呈现。或许，在创作犯罪片的同时，创作者应当不局限于展现犯罪事件本身，毕竟与犯罪者共情不是拍摄犯罪片的目的，而应当关注如何给予观众正确的价值观引导，让观众反思犯罪背后的社会问题。

[谢柳薇、贾冀川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1] 郭星华：《社会失范与越轨行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